

北大招生考试研究丛书

CHONGXIN CHUFA

Zhongmei Daxue

Benke Zhaosheng Bijiao Yanjiu



重新出发

中美大学本科招生比较研究

秦春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招生考试研究丛书

CHONGXIN CHUFA

Zhongmei Daxue

Benke Zhaosheng Bijiao Yanjiu



重新出发

中美大学本科招生比较研究

秦春华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出发：中美大学本科招生比较研究/秦春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
(北大招生考试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6931-2

I. ①重… II. ①秦… III. ①高等学校—本科—招生—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G64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657 号

书 名 重新出发——中美大学本科招生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 秦春华 著

责任编辑 高桂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3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jy@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印刷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10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总 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国家。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曾经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是世界上考试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仅参加高考的人数就接近一千万。

然而,无论是在考试技术、命题水平,还是在测试效果和考试研究等方面,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校招生问题上,多年来我们习惯于通过单一的笔试成绩排序来选拔学生,这种方式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许多对于人才选拔和培养而言至为宝贵的信息。

大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这是大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本科人才培养,更是世界顶尖大学重点关注的核心。一所大学的质量和声誉,主要建立在她所培养的本科人才质量及其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更加重视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在亚洲,一些新兴大学,通过组建新型的本科住宿学院,正在推动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相比而言,多年来,我国重视科研甚于教学,强调研究生教育多于本科生教育,使得本科教育水平相对薄弱,对于本科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以及实现方式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化。

改革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第一步是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高水平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必有赖于第一流的生源质量。高质量的生源,不一定完全通过高考脱颖而出。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学生是否与大学的文化和传统相匹配、相适应,学生是否具备成为优秀人才所必备的价值观和潜质等。对于北京大学而

言,就是要选对“好苗子”,通过培育合适的土壤,为学生提供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氛围,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既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又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既有高尚的信念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又具备建立在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之上的远见卓识,既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又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有浓厚兴趣和广泛涉猎的领军人才。

人才培养是世界上最艰巨最复杂的事业。这一挑战首先在于成效时间长。对于科研工作而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是能够做到的,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效应至少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必须摒弃短视眼光,沉下心来、脚踏实地,通过日积月累的言传身教和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真正立足于人的成长成才去开展扎扎实实的工作。第二个原因是面临复杂的不可测因素。对于科研工作而言,科学家的成就来自于对思维和实验的控制,尽管实验结果常常难以预料,但总是可以通过调整方案和计划不断尝试。而教育的效果必须通过受教育者本身来体现,培养成效的变化和结果极大地受到教育者的影响,这就使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因此,要把一个人真正培养成为杰出的优秀人才,不仅取决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身的努力,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允许失败。科学研究是允许和容忍失败的,所有科学研究上的伟大成就无不建立在无数次的失败之上。教育则不同,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不能像做科研那样进行实验,也无法容忍失败。因为失败的后果会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在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保持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态度,可以大胆地想象,但在具体实施时一定要谨小慎微,看准了再做,稳步推进,最大可能地降低失败的概率。

2013年5月,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考试研究院,致力于推动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探索研究,并按照中央要求,对推进高校招生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提供相应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支持。学校特别聘请在人才选拔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秦春华先生出任院长。考试研究院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提出要出版一套“北大招生考试研究丛书”,特别是要先翻译一批国外顶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有影响的著作。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的,有助于填补国内这

方面研究的空白。我也希望,他们一方面能以此为基础做好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科学合理地建立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录取途径,探索完善多元录取的招考机制。这是更重要,也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恩哥
北京大学前校长
2015年5月

序

大学教育最根本的使命是培养人。培养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环节,是选拔人。多年来,我们比较重视人才培养,在本科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对于人才选拔相对关注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现行考试招生制度按照高考分数统一集中录取,大学缺乏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求选拔与之相匹配的学生的路径和动力;另一方面,大学管理者也缺乏对人才选拔规律的认知与重视。

但我们应当也必须重视人才选拔。教育是双向的,没有好的苗子,怎么可能将其培养成参天大树?固然,能将任何一个人培养成才,可以看得出教育者的本事——正所谓“有教无类”,但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将那些有天赋的学生选拔出来,让他(她)们在更合适的土壤里接受优质教育,未来成长为社会更有贡献和价值的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人才培养的损失,对于顶尖大学而言,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使命。

在一个封闭的低水平教育环境中,人才选拔的效率问题并不彰显。尤其是在考生基数极其庞大、优质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通过高考成绩集中统一录取,不失为一种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选拔方式。但是,在一个开放的正在迈向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中,人才选拔的效率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一方面,如果更有天赋的学生无法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胜出,或者不愿意接受高考前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他(她)们就会选择去国外一流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对中国顶尖大学而言,这意味着优质生源的流失。另一方面,过度的应试训练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使他(她)们既难以适应在大学的学习

生活,也加大了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难度。人才选拔的低效率必然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最终反映为人才培养的低效率。

提高人才选拔效率的关键在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就是改变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传统模式,允许大学按照自身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求,通过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和整体判断决定是否录取。这一点源于大学教育的多样化属性。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殊使命,这意味着它们对于学生的需求是不同的。由于历史传统、校园文化和办学模式的差异,学生进入大学后所接受的教育也会千差万别。这就产生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也使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与此同时,对于同一所大学而言,不同系科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学生也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学生来源的多样性,这使学生在大学里能够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群,从而得到全方位的培养。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尼利厄斯·康威·费尔顿(Cornelius Conway Felton,1860—1862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所言,把来自各地、各国的学生都召集到剑桥,“他们从这个世界获得的歧视与偏见,一定可以通过在共同学习生活中营造出来的友好关系被有效地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人才选拔不应当是单一的,而应当是整体的、多元的和综合的。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如何建立大学招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特别是,如何根据每所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定位,选拔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而不仅仅只是通过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并进而通过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作用?这是摆在中国大学招生机构乃至教育界面前的重要课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促进基础教育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秦春华博士曾担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在担任招办主任期间,他对人才选拔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卸任之后,又去美国一流大学访学交流,认真研究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模式,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欣

闻他要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我乐意为之作序,也希望他和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的其他学者能够继续努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体系,推动中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2016年5月10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美教育比较

中美本科教育之差异 / 3

中美教育观的差异 / 9

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很少偷懒? / 14

何谓好大学? / 20

做你不会做的事 / 25

美国顶尖大学如何保证本科教育质量 / 30

美国大学没有围墙? / 35

什么是有效的教育? / 40

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含义 / 45

人同此情,情同此理

——中美教育没有本质差别 / 51

美国大学招生为何实行综合素质评价? / 57

美国大学招生如何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 63

第二部分 大学与教育

本科教育的核心 / 71

重新认识研究型大学 / 76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阶段 / 82

从“马航失联”看中国的新闻学教育 / 88

何谓素质教育? / 94

优秀的定义包含坚持 / 99

我们应该怎样重视语文教育? / 105

第三部分 高考制度改革

为教育而考试还是为考试而教育？ / 113

无法设计的人生 / 118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 123

高考改革方案的信息发布要统一权威 / 128

改革,究竟改了什么?

——解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132

《实施意见》的教育公平价值取向 / 136

我对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忧虑 / 139

招生标准不宜量化 / 145

第四部分 自主招生改革

推荐的责任 / 153

自主选拔录取是高考制度改革的过渡 / 158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定位 / 163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发展道路 / 168

AP 课程在美国大学招生中的作用 / 173

第五部分 访谈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模式

——答《中国科学报》记者的提问 / 181

“知分+平行”是最坏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

——答《光明日报》记者的提问 / 186

新高考方案对高校招生的影响

——答《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提问 / 193

附录

为什么选择北大？ / 199

后记 / 206

致谢 / 210

第一部分 中美教育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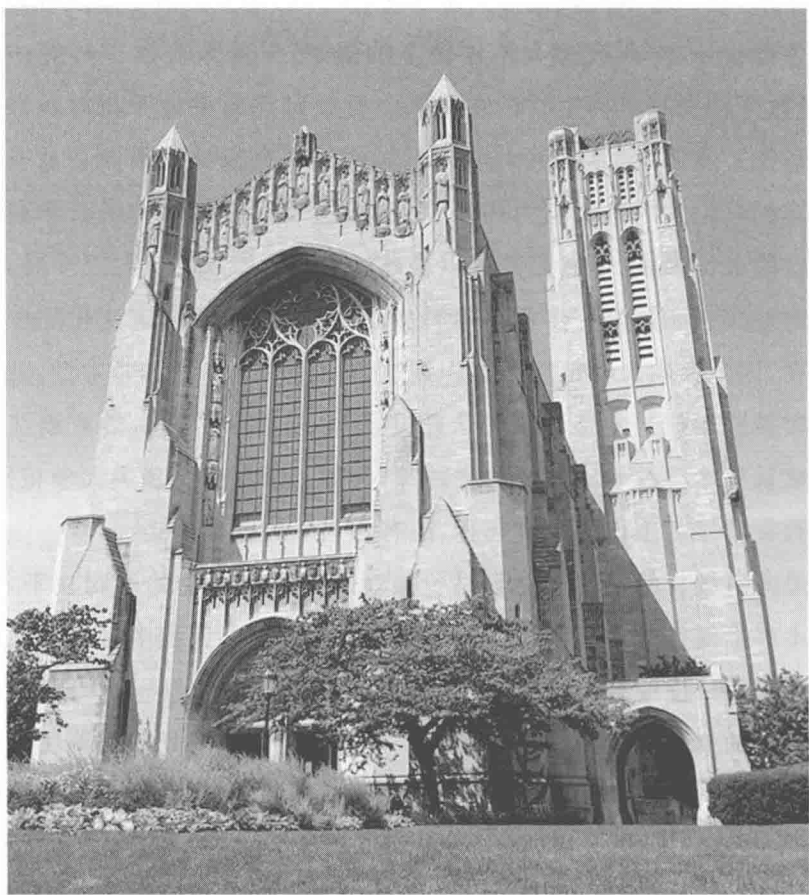
中美本科教育之差异^①

多年来,我们对本科教育口头重视多,实际行动少。由于过度强调科研等显示性数据指标、对研究型大学定位上的误解,以及大规模扩招等一系列因素,本科教育特别是本科生教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甚至边缘化的地位。然而,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对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极为重视。这些大学普遍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研究生院,但最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最终确立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依然是其难以逾越的本科教育质量。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不懈地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和未来。现在,国内顶尖大学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迈出可喜的实质性步伐。先是北京大学开设了“小班教学”课程,后有浙江大学千万元重奖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等等。但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在本科教育领域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一个差异是价值观教育。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美国教授在授课时并没有对学生强调哪些是价值观而哪些不是,但学生在完成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之后,基本上能够确立

^①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4年5月12日第6版,题目为《中美本科教育之差异》。《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16日第10版转载,题目为《中美本科教育的差异》。《教育》2014年第23期转载,题目为《中美本科教育差异》。

起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并且终身难以改变。中国教授把价值观编成教材,辟出专门的课堂和时间进行授课,但学生在考完试以后,很容易就将背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因此,虽然中国大学在学生价值观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仅安排了专门的必修课程和学分,配备了专门的教师,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学院组织教学,使价值观进了教材,进了课堂,但不一定真的进了学生头脑。当然,也有真的进了学生头脑的——学习的过程很难在他们心中留下“痕迹”。其源头恐怕还要追溯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模式所形成的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两张皮”的影响。



洛克菲勒礼堂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学生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在重印),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认真学习研究,否则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当他们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不仅懂得了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且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价值观在过去产生了何种影响。当然,在学生即将面对的未来中,这些价值观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另外一门于同年开设的核心课程是“美国政策的形成”。本科学院院长F. 钱皮恩·沃德认为:“在这些在一起‘学习’和‘思考’的讨论过程中,最后学生们不仅要‘知道’那些他们必须知道的事实,而且,他们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课程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懂得美国政策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形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够领导美国未来的政策。”

相比之下,在中国大学的本科课程中,教师普遍重视知识讲授,往往忽视教学过程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观因素。中国传统师道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三要素中只剩下了“授业”一项,而丢掉了最重要的“传道”和“解惑”。学生只关注老师讲了什么,考试会考什么。至于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前人的分析过程是什么,你自己的独立判断是什么,等等,教师和学生均不关心。和价值观教育相比,他们更关心那些具体可见的技术上的进步。原本重合在一起的“读书”和“做人”的双重职能被分离了。还有的教师认为,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第二课堂”的事,“第一课堂”当然应该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它完全割裂了教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把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上课,把上课简单地等同于讲授知识,却恰恰忘记了这样一个常识:缺失了价值观教育,一切专业知识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走向其反面——专业技能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专业知识好比是0,价值观就是它前面的1。只有有了1,后面的0才有价值和意义。

中美本科教育的第二个差异是重视方式。笼统地说中国大学不重视本科

教育是不公正的,许多大学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做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然而,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重视本科教育教学的方式比较单一。一是强调教授,特别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给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级本科生上课。这几乎成为各大学展示自己重视本科教学的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多年来,教授们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给本科生上课。但这个“进步”却又显得何其荒唐!既然被称为教授,教学自是其工作职责的应有之义;如果不上课,还有必要称之为教授吗?另外,教授上课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上课,上课的效果如何。如果教授仍然以传统的演讲的方式上课,那也只不过是把“百家讲坛”搬到了课堂里而已。学生除了在现场欣赏到教授的表演之外,并不能获得多少智识上的真正进步。二是给上课的教师发放授课津贴。先不说这种方式在逻辑上的荒谬——教师的工资就是其上课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另外发放一份上课津贴呢?那工资本身又算是什么呢?单就其效果而言,这种物质刺激的局限性很大。目前高校在经费管理上的僵化,导致事实上很难给教师发放高额讲课费。因此,与校外演讲以及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课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课津贴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它事实上起不到激励的作用。三是在职称晋升时向上课教师倾斜。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点在于和科研成果的“硬”显现度相比,上课记录几乎没有作为标准的价值——它太“软”了。在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美国顶尖大学虽然也经历了科研和教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争论,但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它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就没有地位,如果课上得不好也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里,这种影响力的价值巨大。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市政府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是因为艺术院校的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街,随时